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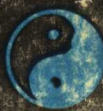
DAOJIASIXIANGSHIGANG

● 黄钊主编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道可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 中国·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 家 思 想 史 綱



道家思想史纲

主 编 黄 钊

副主编 杨达荣 郭树森

杨义银 李刚兴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道家思想史纲

主 编：黄 钊

责任编辑：张 卫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湖南省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20.875印张 521千字 2插图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平装：ISBN7—81031—089—5/B·003

定 价：9.10元

精装：ISBN7—81031—092—5/B·004

定 价：12.00元

简论道家思想的历史定位

(代 序)

道家思想(涵道教思想)在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发挥过独特作用,直到今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但长期以来,国内外却流行一种模糊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即可以代替或代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把传统思想文化单一化、凝固化、儒家化,这显然是不合历史实际的。流行这一观念,自有其形成偏见的历史根源。尽管传统偏见仍在起作用,“儒热道冷”的局面尚未改变。但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学术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道家及道教思想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新进展,涌现出不少的新成果。黄钊同志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一书,以十编三十章的规模,从先秦到清末,结合社会运动的不同阶段,对道家思想的源流衍变进行了系统论析,对道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及其文化功能作了全面评述。这部《史纲》,正是近些年来道家思想研究中引人注目的最新成果,以其史料翔实,网罗面广,评析精当,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并具有拓荒补白的意义。

黄钊同志从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年,曾执教湘潭,游心柱下,积学精思而写成《帛书〈老子〉校注析》一书,流誉学林;继又沿波讨源、斟酌古今而编成此书,以书稿见示,并索序。时予正为桂林道家文化研讨班诸君演讲道家

思想的历史定位问题，草成此文，与此书所论，有同有异，适足以借石攻玉，杂以成纯，因以此文代序其书，盖亦道家传统的濠上论学之意云尔。

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整个人类文化，从来是多源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这从全世界的考古成果中已得到充分的证明。人类文化有趋同现象。但文化传播中的辐射、流徙、涵化、融合等等，实际上都以文化发生的多根系和文化发展的多向度为前提。

就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而言，我们祖先在亚洲东部这大片土地上的文化创造，也是多源发生、多维发展的。且不说新石器文化遗址已发现七千多个，遍布全国；经过长期斗争、融合，早形成海岱、河洛、江汉等三大史前文化区；又经过夏、殷、周三代的进一步发展，更形成了燕齐、邹鲁、三晋、秦陇、荆楚、巴蜀、吴越以及辽阳、西域等地区文化，其传统文化心理的特点，至今在民俗、文风中尚有遗存。仅就上述区域性文化所凝结、交织而成的学术派别而言，在周秦之际已展现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学者对各家思想的特点已有过简明的概括和总结。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学者的概述中，如《庄子·天下》括为八家，除讲“阴阳数度”之学的阴阳家，讲“诗书礼乐”之学的儒家，以墨翟、禽滑釐为代表的墨家，以惠施及辩者为代表的名家外，其余四家——宋钘、尹文之学，彭蒙、田骈、慎到之学，关尹、老聃之学，庄周之学，皆属道家。《荀子·解蔽》所列六家，道家居三；《尸子·广泽》所列六家，道家亦居三；《吕氏春秋·不二》所列十家，道家居五。足见先秦诸子中道家独盛。至汉初，司马谈首次综括先秦学术，归结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在评论中也特别推崇道家。后班固依刘歆《七略》撰《汉书·艺文志》，将诸子括为“九流”，而“九流”中道家的文献著录特多，达993篇（且不计其误列入他家

者)，数量为诸子各家之冠。

《史》《汉》所括“六家”、“九流”，撮其要旨，论其短长，似较先秦书为确，且已论到“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①触及诸子各家多维并存和矛盾两分的关系，但对各家的兴衰、绝续、分合之故，未加细说。

就先秦诸子各家的具体的历史发展而言，阴阳家产生最早、集大成于战国末的邹衍；道家继起，凝成《老子》一书，衍为杨朱、宋钘、尹文、田骈、庄周等南北诸流派；儒、墨渐盛，且有“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蓬勃发展；名家出入于各家之中，法家成熟于各家之后；兵、农、纵横诸家应时勃兴而皆统摄于法家，流行于秦、晋。秦依法家为政，兼用兵、农、纵横，因而能够“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实现封建主义的政治统一。汉承秦制，为惩亡秦之弊而一度重用黄老道家，继又独尊儒术而实为儒法合流，因而得以稳定和强化宗法封建制的政治统治。就理论思维水平的深广度而言，兵、农、纵横以至阴阳、名家，都以其理论上固有的局限而只能依附于儒、道、墨、法四家，而墨家在秦汉之际，以其所代表的“农与工肆之人”的政治地位的失落而归于中绝。真能独立发展、体用皆备、统之有宗的，实有儒、法、道三家。如以多维并存、矛盾两分的观点分别考察，则其离合变化的基本格局似可概括如下：

（一）道、法由相依而分驰——道、法相依，源于齐学传统。周初，姜太公治齐，既因循齐俗，又注重法治，“尊贤而上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雷厉风行，五月报政。相传姜太公著书甚多，皆亡；但太公思想影响及于管仲。管仲相齐桓公，重贤任能，实行改革，今存《管子》书虽非全是管仲遗说，但其中多道、法合一思想，如：“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

法”等。战国时，邹忌相齐威王，进一步实行封建化改革，为礼贤下士而创建“稷下学宫”，“稷下”学者中，不少人兼通黄老刑名，提倡道、法合一，以黄老道德为体，以刑名法术为用。故《史记》以老、庄、申、韩合传，自非偶然；其称“申子之学，出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归本于黄老”，更是明证。

但道、法两家在思想上本有分歧，尤其三晋法家与南方崛起的荆楚道家如庄子等更多舛背。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虽曾著《解老》《喻老》，但韩非直斥“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的道家为“天下之惑术”，断然反对“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轻物重生之士”，认为这直接违反了“重殉上事”的忠君原则^②。在秦统一前后的社会大变革中，法家依附于封建统治集团，以乘势夺利的当权派立场，迷信权势法术，在实践上一度取得成功；而道家则基本上植根于没落贵族下降而形成的逸民或隐士集团，以失势退隐的在野派自居，“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③，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④，因而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更轻视权势刑赏，《老》、《庄》都猛烈抨击依靠法家变革而上台的新统治者是“盗竽”，是“窃国者”^⑤。现实中激化的政治分化，促成了学术思想上的日趋对立，愈往后发展，愈发生尖锐冲突。当儒、法两家政治合流而跃居统治思想的正宗地位，道、法两家则更是背道分驰。

（二）儒、法由相乖而合流——儒、法相乖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中的对立势力，一主“礼治”，一主“法治”，路线不同，针锋相对。孟轲猛烈攻击秦孝公、商鞅等的社会变革是“漫其经界”的“暴君、污吏”，抨击法家，兼斥兵、农、纵横，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⑥，反对法家主张的兼并战争和土地私有化。反之，商鞅则把儒家提倡的“礼、乐”、“《诗》、《书》”、“孝、弟”、“仁义”等

斥为足以“亡国”的“六虱”^①；韩非也直斥儒家学说是“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的“邦之蠹”^②。儒家亲亲而尚仁，宣扬德教仁政；法家尊尊而尚功，强调刑赏法治，在社会变革时期两者似乎冰炭不相容。

但到战国末年，荀况为封建统一所提供的政治理论，已强调了“法后王”“美当今”，兼重礼与刑。儒、法思想开始走向融合。秦汉之际的儒生们面对着“秦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靡然向风”，而由于“仁义不施、攻守势异”^③，仅二世而亡的大变局，不得不总结秦政得失，继承秦制，融摄法家。如韩非所云：“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④此类思想被汉初董仲舒等吸入儒家伦理政治体系，而形成“王道之三纲”，建立起“杂霸、王道用之”或“阳儒阴法”的“汉家法度”，并一直沿袭下去，成为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政统的轴心。章太炎论及此事颇有的见，云：“至汉，公孙弘、董仲舒辈本是经师，其时经师与儒已无分别。弘习文法吏事，而缘饰以儒术；仲舒为《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以应廷尉张汤之问。儒家法家，于此稍合。”^⑤其实，我国传统正宗思想并非儒门一系而是儒法合流，对此，近世先进学者已多有论述。如王夫之指出：后世之所谓“君子儒”“言治道者”，“于老庄则远之惟恐不夙，于申韩则暗袭其所为而阴挟其心”，“言则圣人而行则申韩也”；他称之为“以申韩之酷政文饰儒术，以重毒天下”的“申韩之儒”；并痛切揭露：“下至于申韩之儒，而贼天下以贼其心者甚矣！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韩之儒者，积焉！”^⑥戴震也痛切揭发：宋儒所谓“理欲之辩，适成忍而残杀之具”；“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淫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⑦谭嗣同更尖锐地指出：“自秦垂暴法，于会稽刻石，宋儒场之……独夫民贼，固甚乐三纲之名，一切刑律制度皆依为率”，造成“数千年来三纲五

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他进而概括言之：“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苟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④痛愤之词，不免偏激，却深刻揭示了二千年封建专制政统中儒、法合流的本质。

（三）儒、道由相黜而互补——儒、道异说，源于齐、鲁异政，更衍为荆楚学风与邹鲁学风之取向不同。战国时，孟子力辟杨、墨，庄子则剽剥儒、墨，孟、庄同时而未谋面，但思想路线早已形成对立。到汉初，儒、道互黜、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冲突更尖锐化。儒林博士辕固生与好黄老道的窦太后争论《老子》一书的评价，竟被令入圈刺杀，几乎丧生；申培公被迎来讲明堂事，触怒了窦太后等，导致“隆推儒术，贬道家言”的赵绾、王藏等竟因而被政治诛杀。司马迁曾总结，“世之学老子者则黜儒学，儒学亦黜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⑤此后，司马迁被斥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退六经”，因而《史记》一书竟有“谤书”之嫌；而王充则自命“虽违儒家之说，但合黄老之义”，因而《论衡》一书长期被斥为“异端”^⑥。

两汉时期在政见上的儒道互黜，深化为“圣人（孔子）贵名教，老庄明自然”的学派分歧和思想对立；而东汉时由于大批伪名士的出现，使儒家名教大为贬值，需要起用道家“自然”观念来滋补其生机，于是夏侯玄、何晏、王弼等煽起玄风，强调“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君亲自然，匪由名教，爱敬既同，情理兼到”^⑦。在玄学思潮的发展中，曾自觉讨论过儒、道的异同、离合问题，而大体归宿于“儒道合”，或“将无同”^⑧。无论是偏重于“以儒合道”，或偏重于“以道合儒”，其主旨都在“儒道兼综”，“情理兼到”，以企求“自然”和“名教”的统一。玄学正宗，可以说是从学派形成上初步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兼容和互补。以后，经过佛道二教的激荡而形成宋明道学新思潮。中国化了的佛教哲学和道家及道教思想的渗

透，实为宋明道学的哲理化思辨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学术条件。历代学者多已指明，如王夫之认定：周、邵、程、朱，“器外求道”，乃老氏之旨；陆、王之学，“消所入能”，乃阳儒阴释。^③潘平格更一语道破：“朱子道、陆子禅”^④。所谓“朱子道”，乃指程朱一系思想多承袭于道家及道教理论；所谓“陆子禅”，乃指陆王一系思想多来自禅宗而中国禅宗思想实直承庄子之学。宋明道学正宗，可以说从理论内容上实现了较深层次儒道互补。

学术思想上所实现的儒道互补，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某种社会心理的需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士人一直有在朝和在野之分。但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朝野之间的流动性也不断加大，每个人随时都面临着所谓“穷达”、“出处”，跻身庙堂或退处山林的不同命运，因而决定其立身处世态度乃至价值观念等的不同选择。而儒道两家分别提供的思想体系及价值取向，恰好足以适应人们在不同境遇中的精神需要，可以维持人们在处境变化中的心理平衡。可以说，正如西方文化中有“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对立和互补一样，中国文化主流中也有儒、道精神的对立和互补。

以上从三个层面对传统文化的多维与两分所作的简析，仅系一种宏观角度鸟瞰其基本格局，实际存在着的许多过渡形态和中介环节，未遑细论。

以上所论，粗略地展开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从这一格局，我们可看到道家文化在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曾经发挥了多么重要的历史作用。《道家思想史纲》考察了道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对于认识道家文化的历史作用，促进对道家文化的深入研究，无疑是很有意义的。我祝贺《史纲》的出版！我期待着有更多研究道家的新著问世！

萧楚父

1990年国庆节于武汉大学

注：

①《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②《韩非子》：《忠孝》、《显学》。

③《淮南子·汜论训》。④《史记·老子列传》。

⑤见《老子》五十三、五十七章，《庄子·胠箧》。

⑥《孟子》：《滕文公上》、《离娄上》。⑦《商君书》：《勒令》。

⑧《韩非子》：《五蠹》、《显学》。⑨贾谊《过秦论》上、中。

⑩《韩非子·忠孝》。⑪章太炎：《论诸子学》。

⑫王夫之：《姜斋文集·老庄申韩论》、《尚书引义·舜典二》。

⑬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与某书》。⑭谭嗣同：《仁学》三十七、八、二十九。

⑮《史记·儒林列传》、《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⑯《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蔡邕传》。

⑰王充：《论衡·自然》、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⑱何晏：《元名论》引夏侯玄语（见张湛《列子·仲尼篇注》）、袁宏：《三国名臣颂》。

⑲《晋书·阮籍传》：“阮瞻见司徒王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⑳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五《张子正蒙注·序论》。

㉑李璣《怒谷后集》卷六《万季野小传》引潘平格语。

《道家思想史纲》题辞

源远流长的道家思想文化，数千年来，始终与居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相互对立，相互补充，共同汇成中华思想文化之主流。道家思想以其旷达玄远，气势清高，素为世人所钟爱。黄钊同志主编的《道家思想史纲》（以下简称《史纲》）对此作了多向度、多层次的透视，集中地反映了近年来道家思想研究的新成果。我较早读到书稿，兴奋之余，赘语于此，姑称之为“题辞”。

（一）

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迥异于儒家阐发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而以“道法自然”的自然哲学为构架，培育中华民族的智者气象，发展博大精深的智慧之思，探讨宇宙之本源，生命之奥秘，人生之真谛。坚持特立独行品格，常以异端面貌出现。它玄思宇宙，洞见本根，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在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

（二）

道家思想在同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斗争中，不断充实发展自己，其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史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遵循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对道家思想发生、发展的规律第一次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总结。《史纲》依照先秦、汉唐、宋清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剖析了道家思想发展的历史道路及其特殊表现。

先秦时期，道家思想作为九流十家之一，在百家争鸣中扩展

其理论影响，以其独具的学术包容精神，不断融摄异己思想，从而发展为“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汉唐时期，在“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下，道家思想的发展进入特殊阶段。先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滋生出“杂而多端”的道教，成为尔后儒佛二教的对立面；继而与《周易》思想结合，形成清淡玄风；往后又营建起道教重玄之学，与儒佛并驾齐驱而达到鼎盛时期。

宋清时期，新儒学兴起，理学成为统治思想，道家思想的基本特点多为理学所融摄。道家思想的发展另辟蹊径，它与道教合流，发展性命双修的内修理论，阐发天人合一的人体科学。在文化趋同现象日益浓厚的历史环境里，道家敢于标新立异，卓立独行，出世而不超尘，入世而不流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道家思想趋时更新，不断发展自己的这一历史经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亦具有普遍意义。

(三)

道家思想，不只由于标新立异而传承自己的学脉，更由于繁衍辐射而影响中华文化各领域，从而为发展异采纷呈的中华思想文化作出独特贡献。《史纲》结合历史特点，对道家思想在文化史上的历史作用加以多棱透视，深入剖析。

《史纲》认为，道家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发生发展起了主导作用，在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诸方面，立论之恢宏，运思之玄妙，均为儒法诸家哲学所不及。

道家政治学说，同儒法诸家“有为而治”的经世思想大异其趣，主张“无为而治”。它所阐述的“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的“君人南面之术”，在中国历次“由乱反治”的政治历史转折中，一再发挥其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道家科学思想，同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当古代科学技术被正统思想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横加贬斥时，道家敢于探讨“怪力乱神”之究竟，并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就。若无道家思想的支持和指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要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累累硕果，是不可想象的。

道家重旷达，尚清远，讲玄妙，常以妙思奇想引人入胜，其美学思想对中国文学艺术有着深远影响。浸透在传统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思想，不言而喻与道家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血肉姻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无道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华文化思想难免陷于单调、偏枯与僵化。

(四)

《道家思想史纲》尤以着意揭示道家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而发人深思。

道家坚持“道法自然”的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锐意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奥秘，至今对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疑有着多方面的启迪作用。

道家宏扬“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法则，肯定否泰转化，祸福倚伏，物极必反，使人面临危困而常能保持历史乐观精神。

道家抱豁达大度，持宽容精神，以开放的心态，容纳百家之言，反对独断之论，对于当前思想文化建设，极富借鉴意义。

无可讳言，传统思想文化，有精华亦有糟粕。在总结道家思想历史贡献时，不可忽视其固有的历史局限性。《道家思想史纲》的可贵处，在于对道家思想所固有的局限性和消极面，予以深刻揭露。

道家因其鄙弃狭隘功利主义而走向极端，崇尚虚无，不务实诚；因反对权威，批判社会弊端而放弃社会责任，淡漠参与意识；片面强调树立独立意志而忽视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必要；鼓吹追求绝对自由而走向放浪形骸，玩世不恭；重玄思而脱离现实，崇高远而漠视功利。凡此种种，《史纲》的剖判无不入木三

分。

总之，《史纲》是一部论史结合，古今贯通的力作，令人读之对道家思想刮目相看。《史纲》的问世，对于克服学术界扬儒抑道的传统偏见，批判文化思想界的历史虚无主义，均具有无可争辩的现实作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唐明邦

1991年2月18日于珞珈山

引 论

勤劳而富有智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创造了上下数千年的历史文明，保存着璀灿斑斓的古代文化。丰富而深邃的道家思想，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道家”，指的是以老子思想为宗脉的学术派别的总称。“道家”之名，最初见于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称为“道德家”，简称为“道家”，《汉书·艺文志》将它列为“九流”之一。道家思想源远流长，其创始人是春秋末年的老聃。今存《老子》，基本上保留了老聃的思想资料。《老子》思想博大精深，它上承上古文化，下启百代后学，集古代先贤圣哲之精华，开中国学术思想之先源，对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道家和儒家的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动脉。在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长河中，儒道两家各自起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儒家思想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那么道家思想则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汇合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滔滔大江。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儒道两家在发展的长过程中，却走着不同的道路。一般说来，儒家的发展比较顺利。两千多年来，它除了在秦汉之际这段时间受压抑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处于“独尊”的地位，其学术观点受到封建专制的保护，成为封建帝王的御用工具和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道家则迥然不同，它除了在战国后期和西汉初期走了一段顺利发展的道路之外，其余大部分时间则处于受压抑的境遇。它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夹缝中生存

和发展自己。尽管如此，道家仍然创造出儒家所未能创造出的许多学术成果，因而更显出其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在遭受排斥、压抑的条件下，仍然经久不衰，且与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相媲美，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道家思想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道家思想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呢？这是因为它同儒家相比，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和优势。它以自然型哲学来对抗儒家伦理型哲学，对儒家长期经营的宗法思想文化予以怀疑、否定和批判，在自然与社会、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面，作了比儒家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就其探索的领域而言，从现实的“人间世”到旷广的宇宙（“寥天一”）。在这些领域，它以纵横驰骋的思绪，寻找天地万物的最后本原。在许多问题的答案上，显示出理性的光辉。因而更能满足我们民族理论思维发展的要求。这是任何力量也压服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道家能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发挥自己的智慧，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道家确实对我们民族的理论思维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应当对它加以认真总结和大力发掘。

首先，从哲学上说，道家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开山祖的历史作用。

在本体论方面，道家明确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的核心思想，是把“道”看作产生世界万物的最后本原。尽管“道”的本质属性在其创始人老子那里，呈现着“惚兮”、“恍兮”的模糊性，但正是这种模糊性，启迪着后人围绕“道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有意义的学术探讨，由此而诱发出中国哲学史上关于本体论问题的两种互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一种是以庄子和王弼为代表，把道解释为“虚无”或“无有”，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能生有”的唯心主义学说；另一种以稷下道家和汉代黄老学者为代表，把